

# 在铅墨中寻幽探微

禾刀

对于作者那些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或语焉不详，常常会多方求证，直到水落石出。

后记中薛原就提到这一则小事：在读《郑振铎日记全编》1957年的日记时，发现文中提到楼适夷的一次“大哭”，原因是夏衍对冯雪峰的“揭发”。为了弄清这个细节，他从书架上抽出了楼适夷的《话雨录》，仔细查找发现，里面确有这一细节。而作为当事人的夏衍在回忆录中自然也有这段记载，只是叙述始终与郑、楼二人有了很大区别。是非对错已不重要，但通过多方对比，了然于胸，况味丛生，这大抵是读书人的乐趣之所在。

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，文人自不例外，不同的是文人习惯用笔记下一般人不屑一顾的琐碎。可别小看这些琐碎，细节往往是后人寻幽探微，完成历史信息拼图的重要路径。过去文人喜欢写日记，哪怕是战火连天生活多艰也不放弃。如梁漱溟日记和郑天

挺西南联大日记均超过80万字，内中所记大到人生际遇，小到每天迎来送往，或者所闻的一则小小趣事。由于这些信息各自一体，若从事件角度审视还需细梳理。薛原努力做好一个事实的呈现者，而不是评论者。所以，他坚持努力挖掘与还原必须基于各方面书籍提供的信息。他所做的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，本着最为严谨的态度，将这些信息一一拼接，然后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也是他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书信和日记的原因，毕竟这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，任何转述和评论均难以夹杂新的感情因素。

在谈到施蛰存时，薛原着重还原了这么个细节：1993年6月，施蛰存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，奖金两万元。“在7月26日给古剑的信里，他（施蛰存）写道：‘上海文学奖，第一届是三万元，我是第二届，只有二万元，一切东西都在涨，这个奖金却跌价’”。两万元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一笔巨款。坊间总有这么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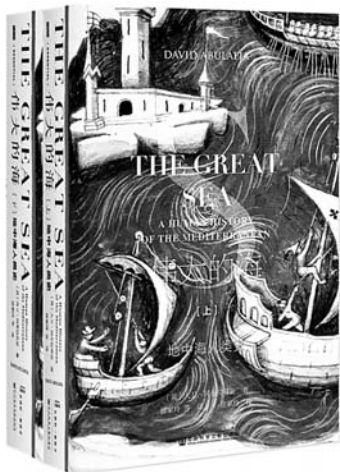
看法，似乎文人就不该谈钱，谈钱就是争名夺利。然而，文人并非道德圣贤，他们也需要生活，虽然不必锦衣玉食肥马轻裘，但至少也可过上好一点的生活。薛原罗列这样的细节，当然不是出于对施蛰存的贬损，而是真实地反映文人的生存状态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文人一旦谈钱似乎总会招致质疑乃至口诛笔伐。

薛原说，有限的阅读是幸福的，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，往往随着阅读的深入，全面的阅读往往会打碎最初阅读带来的幸福——因为或许会看到人性复杂的多面。事实上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，人无完人，文人也无法超脱这一定律，一个人的文字可以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不可能所有的文字都如出一辙，因为历史是由“人民”创造的。

《文人谈》

薛原 著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《伟大的海》  
[英] 大卫·阿布拉菲亚 著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本书通过对地中海五个历史时期的叙述，旨在探求地中海不同程度地融合为单一的商贸、文化乃至政治区域的过程，以及不同融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中结束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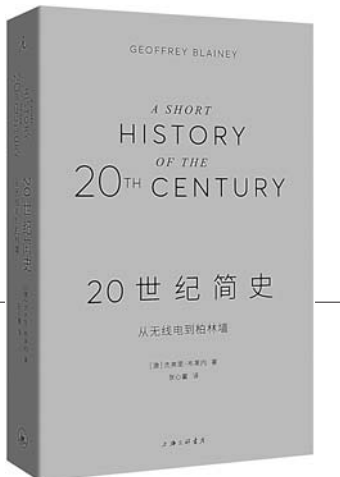
《半梦》  
顾城 著  
金城出版社

“诗人顾城”是一个被固化了的印象，然而，海外生活中的顾城，远远要超越诗人这个标签，以他散文为代表的众多作品均闪烁着不一样的光彩。这就是《半梦》辑录面世的意义所在。



《问米》  
葛亮 著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7篇小说，7个故事，主角都是我你身边的平凡人，因为生活中的偶然因素，坠入深不见底的黑暗，故事带有悬疑感，饱含着悲悯的人文精神，刻画出在命运与巧合束缚中挣扎沉浮的当代男女群像。



澳大利亚国宝级历史学家的“大家小书”，生动地捕捉时代的激动人心，看离今天最近的100年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。作者在大历史和“伟大”之外，追索日常生活分分秒秒的细节，关心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人，让过去的历史复活。

书，它们引人入胜，在1880年到1910年期间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很多读者在长大成人很久之后，还为这些故事着迷。阿道夫·希特勒在成为德国总理之后，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山中居所来了一位十二岁的访客，这位小访客描述道：“我特别看，这位元首在闲暇里喜欢哪种类型的文学。”他发现，当中不少是卡尔·迈的书。将近十年之后战争来临，芝加哥的物理学家正秘密准备引发第一次核裂变，向原子弹的进程迈进，他们为裂变过程的每个部分都取了独特的名字。这些名字出自文化·亚历山大·米恩的《小熊维尼》。昆山素季，日后缅甸的英雄领袖，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金，正是因为她喜欢吉卜林故事里头那个叫金的男孩。

《20世纪简史：从无线电到柏林墙》

[澳] 杰弗里·布莱内 著  
上海三联书店

## 器物之美

□ 林硕

“持器和爱物的意义相同，如果不爱就不会拥有”。柳宗悦这位东瀛美学专家认为，工艺本身带有“爱”的性质，并兼有欣赏的情趣，应当倡导器物的实用之美。

《生活工艺时代》，集结了以三谷龙二、广濑一郎、安藤雅信为代表的十几位日本当代艺术家有关“生活工艺”的随笔，他们在不同时刻、不同场合、不约而同使用了“生活工艺”这个名词，围绕它展开自己的论述，可见“生活工艺”之深入人心，柳宗悦先生当慰矣！

三谷龙二的《就在身边的特别之所》，清点亚麻床单、竹制苍蝇拍、笤帚、风车、酒器盆、纸巾盒子等日常之物让人愉悦的理由。这些器物构成了家庭生活的部分，它们都有着优良的质地、合适的形态、淡雅的色彩等柳宗悦曾经强调过的必须确保的美的要素，它们会让主人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受温馨，这是“美”和“用”之间的交互。这是对柳宗悦美学的继承。

广濑一郎认为，民艺运动并不一定要强调实用之美，“在日用食器领域里表现独特性与个性力量的创作者，应该也是存在的”。这与安藤雅信的观点不谋而合。安藤先生说，“用之美”这个概念不要被语言束缚，“因为美并不只是功能上的美”。小林和人站在传播者的立场，强调生活工艺“应该将不以功能为前提、抽象度较高的造型物也纳入大家的视野”。百家争鸣的态度，正是民艺运动蓬勃之力量。生活是多样化的，对美的评断也当多样。

鞍田崇在艺术范畴之外，扩大了视域，呈现时代的气息与价值观的改变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即“物之美”始终存在于人与环境的调和之中，机械时代对人与物的和谐关系造成了损害，民艺追求回归自然，要求重新协调放置物品的环境。

日本民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，根源于东瀛民族独特的美学理念。黑川雅之曾经归纳“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”，分别为：微、并、气、间、秘、素、假、破。“细微处有神灵”，要以“一期一会”的珍重心情，认真对待产品的每个细节，考虑光线的调和、力学的空间，尤其要将“简素”的准则用以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的单纯化。越是要表现深刻的精神，就越是要极力抑制表现并使之简素化，而且越是抑制表现而简素，其内在精神也就越是深化、高扬和有张力。

《生活工艺时代》

[日] 三谷龙二 等著  
台海出版社

# 1900年,摇篮摇摆之际

□ 若华 整理

已经被她天真痴想的父母看成小神童。在中国，毛泽东年仅七岁，是农家子弟，但他未成长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领袖，结束了农田私有的制度。还有几位主要的亚洲领导人—日本裕仁天皇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—皆出生于1901年。当时学术氛围浓厚，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算术算得更明白，1901年被公认为新世纪的元年。

## 他们的家庭教育

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料到，世界大事的风起云涌、战争的危机与和平将把他们推向何处。从概率上看，1900年的孩童们大多数都不会在他们的一生中远行。众所周知，大多数人会在小地方或小村庄里终老，甚至会和他们出生的房子里离世。

家庭教育在当时仍是主要的教育方式，还没出现各式各样的学校，可与家庭教育的影响相提并论。从斐济到日本，从秘鲁到瑞典，年轻人都是受家庭教育长大的，但是抚养教导孩子的方式千差万别。在热带的新几内亚，各类文化并存，人们讲着六百多种语言。与新几内亚各异的教育方式相比，欧洲内部的差异不是很大。在天主教地区，孩子一生下来就受洗，但在新几内亚的一些地方，孩子要先能活过那段最娇弱的时期，才起名字。倘若孩子在出生的第一周就夭折，人们很少为此哀悼：并非孩子的父母冰冷无情，而是他们以为，下一个孩子会接着降临。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庆祝孩子出生的第七天，多数的欧洲家庭庆祝孩子的第一个周岁生日，但是一些新几内亚人庆祝的可能是孩子第一次剪头的那天。在一些地区，人们有

用树皮布来缠孩子的头以便将其拉长的传统。在1900年，母乳喂养几乎是普遍的做法。在一些岛屿，孩子一岁前就断奶，而在其他的一些岛屿，孩子可能到四岁还在享受母乳。如果孩子尚未断奶母亲就离世，通常就找个乳母，其实就是找另一对乳房代替。但是在新几内亚，他人的母乳被视作毒药弃之。

1900年，很多适龄入学的孩子连一个星期的学都没上过。因为缺人手，他们成为童工，到田地、森林、私宅甚至地下矿井中劳作。没有他们的劳作，非洲和亚洲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更低。可能只有在日本，童工属于罕见的现象。但在印度和中国，有大批的小孩儿在白日里劳作。印度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，仅有1%的女性能读会写。重要的是，在印度规模很小的中产阶级中，竟有很高比例的男孩都上学，甚至上了大学。

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是最早实行强制入学的。义务教育实际上禁止了儿童日日劳作的情况发生。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，甚至才9岁的孩童就在工厂、煤矿和磨坊里做工。他们不知教科书为何物，但到19世纪末，英国已经实行强制入学。英国治安法庭上的两大主要罪行，一是醉酒，二是孩子没有照常上学。

## 没有童年

很多孩子都没什么童年。一位俄国官员在1909年去往中亚的布哈拉，他痛心地看到“9岁的小姑娘们无辜的脸庞，她们瘦伶伶病怏怏的，干枯无力的小手，染有散沫花色斑驳的指甲，托着那么小的婴孩”。她们为了能有些成年女性的样子，把眉毛反复抹成了一道黑线。

亦无视后生晚辈者在下，他是以友以伴甚至以“诤友”身份与古人晤对。夏立君总是以坚实的理性和真挚的感情，使得话语间蒸腾着发自胸腔的热气。文辞铺张扬厉，笔端却又节制审慎，跳跃之间伏流千里，格局宏敞又毫发毕现，理直气正又诙谐幽默。有论者说夏立君彻底拉开了与煽情文、鸡汤文、戏说文的距离，我深表赞同，也期待者明鉴。

夏立君来自山东沂蒙山区。那里民风质朴，人多耿直忠诚，耐劳、耐劳、执拗或一根筋。这里的一根筋，就是一意孤行之意。这些筋性相互血肉关联。忠诚加一根筋，或许就是夏立君的主体个性。我从作家的行为和作品里，看到了某种信仰或神圣——以诚心对文学，向读者敞开他的灵魂。他的文章，除了血液与汗水，没有丁点儿其他水分。

《时间的压力》

夏立君 著

译林出版社

## 一卷读罢头飞雪

□ 丁建元

耐人寻味。圣人贤人，英雄枭雄，君子流氓，武夫屠夫，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，都是人，神性魔性兽性都是人性的组成元素。夏立君从人性切入，以寻绎之功力，清理之胆识，看到古人和今人一样，人性无不在两难悖论中挣扎。但是夏立君不在此停住，他眼观六路，寻幽探秘，左右开弓，既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前，也放在朋友或家庭小背景下，来透视他们的灵魂。他用显微镜瞄准隐秘的病灶，然后，一刀下去，黑血四溅。贾梦玮说它“干净利落，剥皮见骨”，说的真是精准。这是人性哲思、历史哲思的境界了。

人们总说着文当求深刻。细细玩味，好像深必然与“刻”相并，而刻则是尖刻或者刻薄。夏立君文章之深刻自不待言，却绝非刻板文字。文章洋洋洒洒，贯古通今，视野无界，广度、宽度、厚度、深度兼具，又有着暖人的温度。他起古人于地下，有让古人在他的文字里复活或重生的力量。他似无视评判者在侧，

■ 速读

### 那些名人与1900年

那些缔造了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人物，在1900年之时，大多尚在襁褓中，或还是不足十岁的孩童。其中有这么两个男孩儿，后来成了纳粹德国的领袖—赫尔曼·戈林和约阿希姆·冯·里宾特洛甫。阿道夫·希特勒当时十一岁，比他们俩大一些，安安静静不太讲话。在法国，查尔斯·戴高乐正在庆祝他的十岁生日，而后来大力帮助解放法国的战时将军德怀特·艾森豪威尔，当时还是堪萨斯州的一名小学生，恐怕他们俩脚下还摆着玩具士兵。俄国领袖尼基塔·赫鲁晓夫在冷战的危险期执政，而此刻，他还是个农家的孩子，年仅六岁。

年龄相仿的还有小男孩儿“伯蒂”，当时他腿上不得不套着夹板，矫正他外翻的膝盖，还被告知不能用左手写字。他之后成为乔治六世，当时欧洲风起云涌，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君主。尚在襁褓中的鲁霍拉·霍梅尼，八十年后将统领伊朗，成为令人敬畏的“阿亚图拉”(ayatollah)—伊斯兰称谓，在1900年时尚不为西方世界所知。这一年，也是霍梅尼的生年。有几个孩童，离他们日后功成名就的那片土地还很远：果达·梅厄这个乌克兰的小孩，成了未来的以色列总理。她出生之时，以色列还未建国。

还有几个尚在父母怀抱中或街上嬉戏的孩子，他们长大后也都成了国家领袖，而在他们儿时，他们的国家还未建国。南斯拉夫的铁托和肯尼亚的首雅塔。三位音乐家—纽约市的奥斯卡·汉默斯坦二世、德国的保罗·欣德米特和挪威的克劳斯滕·弗拉格斯塔—很快就要上学了。与此同时，早期的电影明星玛丽·毕克馥，